

杜甫草堂唐代遗址考古纪实

荣远大

2001年10月成都市杜甫草堂博物馆建设地下管网时在草堂旧址南大门围墙内侧发现了明代的石质神龛（现已陈列在杜工部祠前面），以及晚唐、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物。这一重大发现，在杜甫草堂博物馆建馆史上还是第一次，尤其是唐代文物出自于杜甫草堂更凸显其特殊意义，因此立刻引起了轰动。成都市文化局和草堂博物馆领导给予了高度重视，成都各大媒体相继作了大量的报道。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迅即派员进入现场，配合草堂博物馆作抢救性清理。在此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唐代灰坑，出土了一百多件唐代的生活用具，如碗、盆、钵、盏、四耳罐等瓷器，以及建筑构件如筒瓦、板瓦等。这些历史文物对于研究唐代地方史、唐代的制瓷工艺和唐代成都地区的生活习俗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专家初步推测在杜甫草堂旧址内发现唐代灰坑，应该说它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唐代人们生产、生活的历史见证。因此建议杜甫草堂博物馆在今后的基建工作中应密切注意埋藏于地下的历史遗物、遗迹，它们能够为杜甫草堂的历史变迁提供最有力的历史依据。时隔月余，又在杜甫草堂的北大门苗圃内发现了大量的中晚唐时期的瓷器。初步分析，它们基本上都是隋唐时期成都青羊宫窑烧造的器物，经勘察发现其分布范围近千平方米，应为一处唐代遗址，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唐代遗址内实际发掘了1100平方米，考古发掘至2002年9月初结

束。经过近 10个月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尤其是发现了弥足珍贵的唐代石碑和唐代的居住遗址。

杜甫草堂唐代遗址西距草堂博物馆北大门约 80 米 南距草堂旧址杜工部祠的直线距离大约 60 米。遗址地层堆积共分两层 第一层为近现代层 厚约 45 厘米 出土有近现代的遗物 如明清瓷片和近现代的沟渠、土坑等 厚约 70 厘米。第二层为宋代地层，出土有宋代的瓷器及其残片以及宋代的房屋建筑遗迹，同时该地层也包含有一部分唐代的生活用具，器物种类有盂、碗、盆、钵、缸、罐、瓶、壶、粉盒、磨具以及砚台、纺轮和钱币等。在瓷砚台上还粘附有墨汁痕迹。还发现一件瓷盂，在其内书写有“甲戌年”的年款。

继续往下发掘 在宋代地层下出现了唐代的水井四口、房屋遗址八座、灶炕一处、窖坑五处、排水沟四条。水井、房屋、排水沟多为火砖铺砌，在用砖的规格上除用唐代砖以外，往往采用汉代和六朝时期的花纹砖，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且出土的历史文物有唐代瓷器及其残片和唐代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铜钱币，尤其让考古工作者激动的是 在 12 月 3 日清理三号井时出土了一方唐代垂拱三年的石碑。在成都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唐代碑刻是极为少见的，特别是在杜甫草堂内出土更显其独特的历史文物价值。碑文所谓“江水之西 平原之上”、“野鸟徘徊 行人凄怆 空余石塔……”的描述与杜诗所曰“古寺僧牢落 空房客寓居”的景观十分吻合，充分证明了与杜甫草堂相邻的古寺就在现今杜甫草堂博物馆一带，它为唐史杜诗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实物材料。对此，《中国文物报》也作了大幅报道。后又在西南角，出土了两座并排的南宋古墓，从中出土了六尊精美的陶俑。

我们所发现的唐代水井和房屋建筑特点，除了它本身所具

有的唐代风格外，个别的还用宋代火砖修补的痕迹，尤其是二号井的上部还出土有宋代的铁钱币，其时代相对较晚。根据这些现象分析并结合其地层迭压关系以及它的形制特点、用砖的规格和出土遗物比较，我们认为杜甫草堂唐代遗址应为晚唐时期的生活遗址并一直延续活动使用至五代和北宋时期。

在杜甫草堂内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发掘，第一次发现了有明确纪年的唐代碑文和唐代的遗址以及大量的唐代的生活用具，它们充分展现了杜甫生活时期的唐代风貌和时代背景，填补了杜甫草堂没有唐代遗址和唐代生活遗物的空白；杜甫草堂自五代韦庄‘寻砥柱犹存’并加以保护以来，至北宋元丰年间大修之后，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纪念杜甫的圣地。唐代遗址的出土有力地佐证了杜甫草堂的历史沿革。成都素有‘扬一益二’之美称，然而能够反映成都唐代灿烂文化的遗址却未能得到保护。

在发掘期间，市委、宣传部以及市人大、市政协领导先后亲临现场指导，对杜甫草堂唐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予以肯定。市文化局以及草堂博物馆、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计划将这处极为珍贵的唐代遗址就地原址保存，作为草堂博物馆的一个新展区，从而提高草堂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内涵，并且以该遗址为中心，集中展示成都的唐代文明，再现唐代‘扬一益二’的成都风貌。

杜甫草堂唐代遗址，与以武侯祠为代表的成都汉代文明和以金沙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为代表的商周文化以及永陵博物馆为代表的唐宋文化、龙泉十陵即明蜀王陵为代表的明清文化，形成了成都完整的历史文化链和文化旅游带，必将充分发挥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社会经济价值。

烈士陵园新松直

——记成都十二桥革命烈士墓地改建工程

卿 阳

成都市文化公园内林木葱茏 翠柏环绕的烈士墓地里 长眠着 36 位为缔造新中国而捐躯的革命烈士。这就是 1949 年 12 月 7 日 在成都解放前夕 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惨无人道地杀害于成都十二桥的死难烈士。

成都解放后，为了缅怀革命先烈，1950 年 1 月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持下，将在十二桥和王建墓发掘的杨伯恺等 35 位革命烈士的遗骸，连同在重庆渣滓洞牺牲的周从化烈士的遗体一并安葬 修建了墓地 命名为“十二桥死难烈士墓”。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 烈士墓地几经改建 现已成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缅怀革命先烈，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场所。1988 年被成都市政府批准为市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1995 年被四川省政府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十二桥烈士墓为解放初期所建 虽经多次维修 但几十年的风雨侵蚀 墓碑风化严重 再加之墓地小 场地窄 远不适应每年数以万计的中小学生和人民群众前来寄托哀思，缅怀先烈。

对此，成都市委、市政府及市级相关职能部门都十分重视。2000 年 11 月 13 日市政府召开了有市民政局、市建委、市财政局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十二桥烈士墓地改扩建协调会议，决定将

改扩建工程纳入市的基本建设计划，并委托四川省建筑设计院、成都市雕塑绘画院制定了十二桥烈士墓地改建方案，又征求了各有关方面的意见，最后经市委、市政府批准，于2001年12月18日正式动工实施，经过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烈士墓地改建工程提前近半年于2002年6月竣工。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1周年，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7月1日上午，市委、市政府隆重举行了十二桥烈士墓园改建工程竣工典礼。市委副书记黄忠莹主持了竣工典礼。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春城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全市人民，向长眠于此的十二桥革命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向烈士们的家属致以亲切的慰问。李市长在讲话中要求全社会广泛、深入、扎实地开展宣传学习革命烈士的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记革命历史，发扬光荣传统，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为成都的跨越式发展而努力奋斗，用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成都军分区、民革、民盟、烈士家属向烈士敬献了花圈。

十二桥革命烈士墓园改建工程，由成都市民政局、市建委、市财政局三家共同筹资306万元建成。改建后的烈士墓园总占地面积6816m²，由烈士墓区、两座雕塑《晨曦》及《缅怀》、陈列室及廊亭、绿化区、广场和墓园名碑等组成。

改建后的十二桥烈士墓园为方形，坐北向南。烈士墓园南出入口处正中为一花台，内横立一座用红色花岗石刻有“十二桥烈士永垂不朽”9个大金字的墓园名碑，此碑长约6.6米，高1.7米。墓园名碑前立有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分别确定十二桥烈士墓园为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青少年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4个标志石碑。

墓园名碑两侧为南出入口通道，进入墓园广场边两端为对

称的两组仿古川西民居建筑——陈列室及廊亭，建筑面积各为 122m^2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陈列室长 8.4 米，宽 6 米，高约 7 米，悬山屋顶，兰灰色琉璃瓦屋面，正脊、垂脊均用琉璃筒瓦做成，吊檐为半圆莲花纹。4 根角柱为钢筋混凝土而成的红色垂花柱，砖墙白面，门窗为木质、黄色，彩色磨石地面。

长廊与陈列室相连成直角，长 18 米，宽 4 米，高约 4 米，兰灰色琉璃瓦屋面，正脊和单垂脊用琉璃筒瓦做成，半圆莲花纹吊檐，8 根檐柱为钢筋混凝土而成的垂花柱，两侧置明式护栏飞来椅，柱、椅均为红色，彩色磨石地面。亭以瓶门与长廊相连，为正方形，攒尖屋顶，垂脊四角飞檐，有高耸势昂之势，兰灰色琉璃瓦屋面，半圆莲花纹吊檐，4 根角柱为钢筋混凝土而成的垂花柱，亭内三面置明式护栏飞来椅，柱、椅均为红色，可供吊唁者及游人小憩。两组建筑古朴典雅，形成对景，与周围的环境相映成趣。

步入墓园广场，即见一组高 3.5 米的母亲携孩子，手捧鲜花，面凝崇敬神态，悼念烈士情景的双人汉白玉雕塑——《缅怀》，面向烈士墓区，屹立在广场南端墓园名牌后小花台前。雕塑生动形象，表示人民群众对革命烈士的怀念和敬仰，使烈士墓园的主题和形式更加完满。

可容近千人的广场占地面积 1288m^2 ，浅色花岗石地面，为大型悼念活动之用。广场东侧出入口正中一园形花台中，立有一座用红石雕刻而成，高达约 10 米的城市雕塑《巨手》。西侧出入口正中为一长方形花台，植有苏铁、时令花草，并有四怪石点缀其间。

过广场，上 6 台阶，便是占地面积 670m^2 的烈士墓区，36 位革命烈士的墓碑，分 4 排，每排 9 位安葬于此。烈士墓碑用红色花岗石刻制而成，为卧式长方形，正面刻有烈士姓名、生卒时间，

背面为烈士生平简介。墓碑排距为 1.5 米 以方便群众悼念祭奠。

紧靠墓区的背景是占地面积为 500m^2 的巨型浮雕群——《晨曦》。这座浮雕群长约 20 米 高 7 米，用红色花岗石雕刻而成。设计者独具匠心 立意新颖 以《晨曦》为主题 所构思展示了十二桥烈士公墓是共和国成立之后而建，革命烈士在黎明已经来临之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光荣牺牲，英烈化作满天的朝霞和晨星，共和国的旗帜染着烈士的鲜血，记载着先烈不朽的英名。

在造型设计上 设计者考虑到吊唁活动的功能需要 烈士形象采用浮雕表现。根据 36 位烈士的容貌神情和英雄事迹，组织成长 20 米飞动的长卷浮雕，烈士形象用充满力度的造型手法组成满天的朝霞；飞动的长卷可联想到国旗；五角星既是满天的晨星 又表现了 36 位烈士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各个民主党派的先烈，展现了新中国的建立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各种进步力量共同奋斗的成果。这座浮雕取材红色花岗石，喻为红色是英雄的色彩，花岗石是最长久的石材，数十年后不易风化，先烈永远活在世人心中。

雕刻大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 精雕细刻 以精湛的技术 将 36 位烈士的英雄肖像，雕刻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音容宛在，名字与形象能直接辨认，完全有别于其他象征性的纪念雕塑。

《晨曦》雕塑群两侧相连着青石墙 右侧青石墙长约 6.5 米，高 2.8 米 刻有以市民政局、市建委、省建筑设计院、省雕塑艺术院、市文化公园等 12 个单位名义的十二桥烈士墓园简介；左侧青石墙长约 8 米 高 2.8 米 刻有十二桥烈士简介。

整个烈士墓园绿化面积为 2483m^2 是按绿化专业标准和要求实施的，从而把握了绿化植物配置的总体效果和景观效果。

绿化以烈士广场为主体 四周绿地规整排布 时令花卉、葱茏林木环绕墓园四周。

具体配置上突出以烈士墓区和《晨曦》浮雕群为绿化重点，两侧为植有翠柏、罗汉松等名贵树木为主的对称方形绿地 浮雕群后植有 30余株高大四季常绿的雪松 墓区两侧活动平台外侧各植有 5 株高大塔柏，台阶下两端斜面小花台植有时令花卉草坪。陈列室及廊亭四周也配置有花台 内植腊梅、塔柏、竹子、杜鹃等花木及草坪。为体现总体效果，绿地还配置了夜晚光彩设备 昼夜照应 光明常在。这些都增添了墓园园林气息。这些绿化配置喻为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营造出庄严肃穆的背景气氛 烈士长眠于鲜花绿叶丛中，显示出和平安宁的氛围，烈士抛头颅，洒热血 换来今日祖国的欣欣向荣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 应加倍的珍惜。从而 使烈士墓园配套绿化的基本风格特色 既形成了强烈的背衬效果 又具有较高的景观观赏价值 还与公园大环境景观风格协调适宜。

仰观新改建的十二桥烈士墓园全景：枣红醒目的墓园名碑，古朴典雅的陈列室及廊亭 洁白无瑕的《缅怀》雕塑 宽阔方正的吊唁广场 庄重肃穆的烈士墓区 气势雄伟的《晨曦》浮雕群 四季常青的绿化配置 交相辉映 浑然一体 营造出一组组层次丰富 错落有致 有色彩 有对比的空间体系 构成一幅蔚为大观的经典画面。

厅长卖税官内幕

林 雄

这是一段真实的史实 虽然事隔 56 年 但在历史进程中它也是一段震惊蓉城和巴蜀大地的爆炸新闻。

话得从 1946 年说起，是年上半年，成都梨花街清平里附 6 号的《政声报》诞生了。《政声报》的来头不小 它是由川中党政军各部门的头面人物、社会名流和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建的。成员中有各派系成员 如昆仲系、新政学系、CC、董家山集团等等 都是知名度较高的实权派。人物中包罗万象 关系之复杂可想而知。

报社社长李启圣、总编陈岱封 编辑人员中有部分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宣传处的编审 如斐梦龄、陈国本、瞿泰宣等人。国民党宣传处掌握的情况多 而且经过核实 所以披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准确无误。

卖官丑闻 触目惊心

1946年上半年 四川省政府财政厅在各县市 设局成立税捐处，这是刮削民脂民膏的肥缺。税捐处长人选决不是一般凭关系委派、委任可得的，这必须进行钱权交易。国民党政府本身腐败无能，贪赃枉法成风，遇上这样的机会岂能轻易放过，卖税官一幕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

是年6月报社编辑陈国本写了一篇文章揭露四川财政厅
长邓汉祥出卖税捐处长的十大罪行。报社负责人及编辑、记者
共同讨论了这件事，大家同意冒风险发表这篇文章，老虎的屁股
就要摸 太岁头上也敢动土。

这条从未有过的特大丑闻曝光后 震惊了蓉城！《政声报》
的“小钢炮”专栏同时猛烈抨击了出卖税官的罪行。据揭露：一
等县 包括市 的税捐处长要价黄金 20 条以上 二等县的税捐处
长 15 条以上 三等县 包括设治局 的税捐处长黄金 10 条以上。
全川共一百多个县，其贪污数量之大可谓惊人！如果说是厅长
独吞独享是不可能的，其幕后还有比厅长胃口更大，坐地分赃的
人在。买官卖官并不是钱权交易后就可以走马上任，除资历符
合条件少数者外，多数人还要等候时机，而这些人一上任心狠手
毒，刮地三尺不嫌多。原因是这些买官者，除了收回买官本钱
外 还要加倍捞回利钱 受其盘剥者还是普通老百姓。

丑闻败露 四处探询

四川省财政厅长卖税官的丑闻败露以后，成都各大报纸纷
纷发表消息和评论文章，整个巴蜀大地闹得沸沸扬扬。当事者
慌了手脚，于是运用了各种关系四处打听，暗摸虚实。起初，他
们认为与国民党省党部有关，找了黄主委和不少委员，但不确
切。又认为与“中统”、“军统”有关系，又无实据。还在报社发起
人中探询了不少人，但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结果。于是托了某大
学的教务处长（当时住梨花街清平里 2 号）找报社负责人交谈也
未落实。四川省党部宣传处长余成勋（四川省政府委员），知道
揭露卖税捐处长丑闻是他属下陈国本所为，他认为作得好，给予
支持，要他放手去干，但必须讲实话，至于其它问题由余负责解

决。但实际上,《政声报》决非宣传处的工具。

《政声报》既不属于任何派系及党派组织,也不是从属于哪个达官显要的附属品。这家报纸是集资兴办,自闯出路,有它的言论自由和独立性,且受到多方面支持。因此,敢说敢干,不畏强权,是这家报纸的特色。

软硬兼施 采取暴力

通过摸底无着,厅长大人恼羞成怒,于是采取暴力手段,企图杀人灭口,以消心中之恨!

1946年6月的一天,报社的负责人、编辑、记者大都外出联系或工作,要在中午或下午才陆续回报社。当天下午正、副总编辑乘坐人力车回到梨花街报社大门外时,看门的刘大爷急忙走到街上,悄声地说:“不要进去,里面有十几个凶神恶煞的人提着手枪要找报社的人”。我们当时心里明白了来者不善,很感谢刘大爷的关心,并假意大声说:“大爷请你转告他们改天再来”。当即我们坐原车赶到督院街四川省政府,会到了机要室机要秘书邹某,并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出于对朋友的关心,他叮嘱我们这两天暂不回报社,等把事情调查清楚后再通知我们。事情果不出我们所料,此事是厅长所为。于是与新闻同行联系后,成都各报又发布了企图杀人灭口的丑闻,对贪官污吏的阴谋又是当头一棒。

行凶杀人的消息公布以后,引起了四川警官同学会的关注,该会理事长张定国当时是成都市警察局南区分局的负责人之一。他是警官同学会负责人,担负四川各县、市、警察局局长、科长、督察长、局长等的联络工作。《政声报》的正、副总编辑是四川警官同学会的理监事。由于南区分局与报社相距大约500

米 而张定国既是同学 关系也很好 他知道这一情况后 叫我们不要怕，暗中派人在梨花街和清平里报社住地一带进行保护。这事件又牵动了不少关系 问题越搞越复杂。

封官许愿 企图了断

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不会停止，贪官污吏也决不会退出历史舞台 因为他们是贪婪者 是吮吸民脂民膏的寄生虫 但也是闻风变色的“变色龙”。经过一场生死较量之后 当事者摇身一变，用软套套企图了断此事。

有几位身居要职有影响力的调停者突然出现。其中有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几个委员、董家山集团 成都的派系组织 的主要成员之一，还有想捞油水的 CC 头目，假冒报纸是他们主办的 还有好心的大学教务处长 再次出面为此事奔波。他提出了几个条件：一、停止对厅长的攻击言论 二、报社有困难愿出资支持 三、愿意从政的 县长、田粮处长、税捐处长可以解决 但不超过 7 人 而且保证兑现。这一消息不知是谁透露以后 豺狼虎豹一齐窜出 有的张牙舞爪 有的张开血口想全部吞掉 欺诈、威胁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但当时报社的印刷经费、人员开支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虽然后来李铁夫先生担任社长，出资办报 但没有维持多久 加以报社有几位主要负责人被委任其它工作 年底 这份报纸被迫停刊。

胡宗南在成都设秘密电台始末

刘中柱

蒋介石的心腹爱将胡宗南在成都设秘密电台的事少有人知道。该电台与安康、甘孜两电台连成一线，经常向胡宗南提供川康军政活动情况。这个电台设在成都汪家拐，从设立到消亡共活动了 12 年，其有关情况概要如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以其亲信将领胡宗南率领重兵镇守西安，主要任务是监视八路军，同时也窥窃川康军队的动态。蒋介石既仇视共产党，也对川康部队有疑虑之心，企图同时监控，便将此意图作为任务授与胡宗南执行。胡在成都设电台便是为了执行此任务。

这个电台系统名为“三点一线”，即以一电台设在成都（现汪家拐），以一电台设在陕南安康，这是川陕边缘的大巴山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另一电台设川康藏要冲的甘孜，可以了解康藏军政动态。成都是一级台，以成都为中心，将三电台连成一线，随时收、发川康军事情报，互通情况。这等于是蒋介石、胡宗南安插在川康地区一组看不见的潜伏哨。

成都、安康、甘孜三个电台先后设立于 1937 - 1939 年，因恐引起当地注意，故以秘密方式设立，其规模是由小而渐大，其设备是由一般而到先进。在成都，后因人员增多，惟恐外界存疑，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则冠以胡宗南部队驻蓉办事处的名义。该处人员随着局势变化，愈增愈多，最多时曾达 200 多人。内设情

报、总务、机务、警务等科股，但都是为电台而工作。电台的台长叫杜吉贵，四川渠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通讯科，擅长于无线电通讯，尤对无线电机装拆、维修、故障排除以及收报、发报、破译等技术有独到之处，并且还掌握了精湛的汽车驾、修技术，甚得上司赏识。在抗日战争胜利、日军在芷江投降时，原国防部分配了一批军用物资给胡宗南，杜吉贵受胡之派遣，前往芷江接收了一大批无线电器材和一些交通工具，更充实了成都电台及所属的安康和甘孜电台。

在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部队的驻蓉办事处是由一个姓刁的少将在领导，为了获得相关情报，他经常去“拜访”邓锡侯（原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文辉（原西康省主席）、王陵基（原四川省主席）、林茂华（原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王元荣（原四川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黄隐（原国民党 95 军军长、川军）、唐景佖（原四川民众自卫总队长）和吴宁权（原四川警保处长、筹川康军政要员），还与一些军、警、宪、特头目相联系，特别与北较场的中央军校校长（该校前任为关麟征、后任为张耀旺）接触甚密。每次蒋介石到成都时都必住在该军校，且系胡宗南先到成都来接侯。而胡宗南则住在汪家拐的驻蓉办事处内，其办事处专门为胡特设了一套严谨而舒适的办公室和寝室。胡在成都时常利用电台了解所属部队的情况，进行指挥部署。

1949 年冬，蒋介石命胡宗南率 11 个军、29 个师到成都地区，并集结德阳的裴昌会兵团、什邡的孙元良兵团、新都的陈克非兵团、中和场的李振兵团、广汉杨汉烈的第 20 军、彭县黄隐的 95 军和王陵基的 15 个保安团等，共约 40 万兵力，图作最后挣扎，准备决战。而解放军的二野主力部队和 18 兵团及四野的 50 军等部队，已从川东、川南、川北三方同时进军，迅速对成都地区形成了严密包围。不久，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裴昌会等纷纷

率部起义，给蒋军措手不及，腹背插刀。而解放军的包围圈愈逼愈紧，兵临城下。蒋介石鉴于危机四伏，形势紧张，仓惶间授权胡宗南全面指挥，匆匆于12月10日由凤凰山机场飞去台湾。与此同时，解放军第10军30师已从井研渡岷江全歼青神守军后，继续向新津、邛崃、蒲江挺进，打响了成都战役，截断了蒋军的退路。此时，胡宗南如瓮中之鳖，进退不得，见大势已去，便将兵权交其参谋长盛文指挥，他自己则于12月21日乘飞机逃到海南岛转台湾。盛文临危受命，欲突围南逃。此时的成都电台人员已并入总部随同部队南窜，殊至新津，已闻宝资山、狮子山、草帽子山、老君山等地发生激战，且相继解放，而邛崃方面亦受截击。突围无望，大势已去，盛文于慌张中亦弃部队不管，而去太平园机场飞逃台湾。盛文一跑，树倒猢猻散，总部人员也各自奔命，逃之夭夭。原来成都电台的人员，此时亦作鸟兽散，其电台等设备自然成为了解放军的战利品了。至此，蒋军在大陆最后所剩的这40万部队，在这次成都战役中，除有的起义和有的投诚外，其余全部被歼被俘了。

胡部成都电台台长杜吉贵，原与盛文有一定私交，盛在逃走前夕曾私下许诺带杜吉贵及其家属同机飞去台湾。但当杜将夫人和小孩如约定时间和地点赶到时，飞机早已飞走了。这时候，这位台长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又急又气，不得已只好垂头丧气带着家小投奔成都的岳母家（杜妻系成都人）。殊至红牌楼时，适遇故友韩师长，此时韩正率青年军向解放军联系起义事宜，遂将杜吉贵留在该部队，最后终于一起投靠人民，参加该部起义。

起义后，杜吉贵和青年军官佐一起编入解放军18兵团，在大慈寺内学习和整训，后来分配去新疆开汽车，又后，返回成都，在街道工业工作。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杜恢复了起义人员待

遇，其子女亦均立业。现杜年事已高，但犹关心祖国统一事业，常与在台湾的黄埔同学交流感情 促其访谈。不过 他每次提起当年担任电台台长事时 无不感慨万千！

国民党宋希濂兵团覆灭记

焦东海

国民党宋希濂兵团是怎样在四川覆灭的，近年来国内各媒体讲得很多，有的还讲得十分离奇。宋希濂兵团是被我们 18 军 52 师 155 团消灭的。当时虽然我还在 52 师师部筹粮队任分队长 未到 155 团参加战斗 但我参加了训练俘虏的工作 了解一些情况 以后又调入 155 团任记者，了解的情况就更多些。前几年收集整理这段历史材料 我又采访了几位老首长 看了一些史料 知道的就更为详尽全面了。我觉得 现在我有责任把这个材料作个全面记述，以正视听。

第一次交手

宋希濂，湖南省湘乡县溪口人，1907 年生，黄埔一期毕业。1925 年经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山舰事件”后脱党。1931 年上海‘1·28 事变’后 在保卫大上海的淞沪战役中任旅长 他喊出了‘宁为战死之鬼 羞作亡国之民’的悲壮口号 率部浴血抗日，艰苦奋战，最后一个旅大多血洒疆场，所剩无几。以后任军长，在卫立煌将军率领下赴缅甸对日作战，又屡立战功 名声显赫 可谓蒋介石手下的一员战将。遗憾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站在反人民的一边追随蒋介石疯狂地打内战。

1949 年我军千帆竞渡长江后，宋希濂任国民党川湘鄂绥靖